

川端康成的文学与战争经历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李圣杰

[摘要]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川端康成二战期间沉迷古典文学,超然物外,对战争不持褒贬,或明哲保身,或遵循中庸之道。然而,本文根据川端两次中国东北之行和出任日本海军特攻队基地报道员一职的经历,考证发现川端曾参与迎合时局、有助日本国策的活动。1937-1945年期间,川端对战争有过迷惘、推崇、质疑和否定的复杂心理过程,并非日本学者所言那么超然物外。毋庸置疑,川端对战争本质的认知过程是痛苦的,给他的精神世界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并对他战后的文学创作和生死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川端康成 中国东北之行 随军记者 战争经历

引言

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作品颇丰,多富抒情和古典华美,擅以意识流手法刻画人的内心,亦蕴含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晚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日本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故在文坛享有盛名。川端虽受众多学者的青睐,但对其战争的态度问题鲜有研究涉及。综观日本学界的研究权威长谷川泉、羽鸟彻哉、林武志等人的观点,大致归为三点:一、川端对政治不甚关心,战争期间远离尘世,沉湎日本古典文学;二、日本战败扣击了他的内心,但他执意书写日本的“传统美”,以遂余生使命;三、川端爱好和平,希望战争消失于人间,日本民族融于世界大家庭,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这些观点似乎有“为尊者讳”之嫌。国内的川端文学研究学者也曾对川端文学与战争的关系做过考察,或因资料所限,不乏商榷的空间。川端本人也在《哀愁》《战败时刻:昭和二十年的自画像》等文章中曾表白自己的创作在战前战后无甚差异,未受战争影响。然而,研读川端康成战后的作品,不难发现川端的战争经历对他战后的文学创作轨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建立傀儡政权,强制推行文化教育,日本文学界对此也有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战争期间,川端康成过着近乎半隐居生活,表面上既未创作颂扬战争的作品,也未发表明确反对战争的言论,似乎超然象外。

然而,随着一些新资料的挖掘面世,使我们对川端康成的战争经历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1995年11月11日《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作家是如何协助战争的?旧内务省的思想统制团体“悬话会”资料的新发现》的报道,称在日本岩手县江刺市(位于日本岩手县内陆中南部,2006年2月20日,与水泽市、胆泽郡胆泽町、前泽町、衣川村合并为奥州市)发现了二战期间日本内务省企图利用文学界影响力宣扬战争而设立的“文艺悬话会”的内部资料。该资料显示,“文艺悬话会”在设立之初,约有20名日本作家参加,其中就有川端康成的名字。由此可见,川端显然没有“超然”于战争之外。然而,这篇报道并未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抑或不想关注,其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川端康成是位背离战争的作家。为此,笔者查找了相关史料,发现川端确实有过不少参与战争相关活动的

经历。当然,仅凭《川端康成全集》中的内容去考证,可能有失偏颇。川端康成的作品以全集的形式出版可以追溯到1934年,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了《川端康成集 第一卷》,但当时只出版了这一卷便停刊了,具体理由不明,可能与战事扩大、日本政府严格限制用纸等因素有关。之后以“选集”“全集”的形式多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作品集,最为完整的全集是由日本新潮社出版的37卷本(全35卷·补卷2卷)《川端康成全集》(1980年2月-1984年5月)。故笔者对川端1937-1945年期间的小说、散文、日记、书信以及当时报刊杂志的报道、相关作家的文字记录做了梳理,对川端与战争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认知。

1 川端康成的中国东北春季之行

首先,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一些端倪。如在《战败时刻》中写道:“即便作为军队报道员,我也未能奔赴前线,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唯独昭和十六年(1941年)的春天和秋天从中国东北去了华北”^[1](笔者译)、“昭和二十年(1945年)四月,我第一次被征为海军报道班成员,去了特攻队基地的鹿屋飞行场。他们嘱咐我当前不着急动笔,希望能亲眼看一下特攻队。我与新田润、山冈庄八同行。”(川端(28),1982:8)(笔者译)可见川端康成在战争期间,以记者身份到过中国东北和华北,甚至做过特攻队基地记者。关于此行,日本学者奥出健在专题论文《川端康成:战时中国东北之旅》中,分析了川端有关中国东北的文章,但考据多出自川端康成夫人秀子的回忆录《和川端康成在一起》。笔者除此之外还查找了《伪满洲日日新闻》、川端与夫人秀子、养女政子的往来书信,阅读了川端以随军经历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生命之树》、同行作家新田润(1904-1978)、山冈庄八(1907-1978)的相关记述、以及特攻队队员杉山幸照(1922年生于台湾,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部。1943年12月参加了学徒出阵,第14期飞行预备学生,海军少尉。1945年3月,作为特攻昭和队分配到鹿屋基地,同年6月,接到归队命令返回谷田航空队)和

海军军官高户显隆(1915年生于日本熊本县,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42年出任海军中尉)撰写的资料,感到川端参与战争有关活动的映像愈来愈清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川端康成在当年9月的《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同人杂记》,称“中日战争如果结束,其后,文学者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恢复和平后首先能够亲近和慰劳中国人民的一定是日本文学。我们不能忘记国外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够懂日语的唯一国度便是中国。一夜之间创作出粗糙的所谓的战争文学,切勿将这种耻辱遗留万年。比起欧美,我更想去中国、印度等东方各国。如果身体强壮,我还想做一名从军记者。”^[2](笔者译)川端能对战争文学的粗糙性提出批评,说明川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初还拥有文化人的良知,而“想做从军记者”的想法却有些出乎意料,体现了他的一种态度。如果说川端对战争的认识颇具局限性,那么渴望体验战争的想法则是他迷惘的选择。川端自幼体弱多病,随军记者的“美好”愿望没能马上实现。他在1937年9月1日《朝日新闻》上发表了《本因坊名人引退围棋观战记》,字里行间透露出想去中国的愿望。这种愿望除了他对亲睹战争实况的渴望,也不乏自幼对文明古国的憧憬。1941年,川端终于实现了已久的愿望,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度过了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光,这也是川端有生之年第一次长时间远离故土,寄身异国他乡。

川端康成的中国东北之行可分为春秋两次。春季,川端受邀观战1941年4月5日在长春举行的新人围棋锦标赛。川端随特邀评委、著名棋手吴清源(1914-2014)4月2日从神户出发,5月16日又返抵神户,历经一个半月。主办方全程跟踪报道了川端的此次行程。在此期间,川端给夫人秀子写了5封信、1张明信片,发了2通电报。川端将这段经历写进了《从长春到北京》、《伪满洲国的文学》的文章中。根据夫人秀子的回忆录《和川端康成在一起》和《伪满洲日日新闻》(笔者调查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制作的胶卷资料)的相关报道,川端的春季行程如下:3月31日,川端康成携夫人秀

子从东京站出发。据夫人秀子记载,“丈夫4月2日从神户港出发,在下关与村松梢风汇合,经由朝鲜半岛于4日抵达长春。”1941年4月3日的《伪满洲日日新闻》报道为:“四月三日下午十点十六分到达下榻之处”,但秀子夫人记述的是于4日抵达长春。因是3日深夜较晚抵达,因此可推断可能导致秀子夫人误认为第二日才抵达长春。之后,川端考察了沈阳、哈尔滨、承德、北京等地,13日从大连港乘坐“阿根廷丸”返回日本,16日早上到达神户,18日抵达东京。而同行的秀子夫人则在京都下车,顺便回了在大阪的秋冈家,其后一直旅行到4月8日。

川端的春季之行,除了观战围棋大赛外,还举行了一次以他为主的座谈会。座谈会的时间是4月5日下午6点半,地点在长春羹香春饭店。出席的有作家檀一雄、北村谦次郎、刘爵青、绿川贡、田中总一郎,还有伪满洲日日新闻社总部的筒井俊一、古长敏明等人。《伪满洲日日新闻》分4次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关于座谈会内容,日本学者奥出健指出,“对于川端而言并非太重要的资料”^[3],但综合座谈内容,笔者认为奥出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在座谈会上,川端主要询问了在中国东北作家的生活状况。看似平淡无常的座谈会,实质是伪满傀儡的精心策划。在日本当局的授意下,伪满政府成立了联络文艺人士的最高机构——“艺文联盟”,其目的是利用在中国东北文艺界的影响力,强化日本对东北民众的思想统制。因此,在伪满作家所公开发表的作品,都要受到极为严格的审查。川端在座谈会上提出,在中国东北作家应与日本出版社保持紧密联系。他返回日本后随即联络出版了三本有关的伪满洲文学的书。川端在《中国东北的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想写这个国家,既是出于对中国东北的尊敬,也算是一种热爱。值此十周年之际,这也是我送出的礼物,当然这也算是我旅行带回的特产吧。”^[4](笔者译)川端来到中国对中国东北作实地考察,并从事文化活动,这本身就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一种支持。

川端在《从长春到北京》一文中说,“在伪满洲

的国民学校,日语不是外语,可与汉语一起教学。”(川端(27),1982:301)(笔者译)这无疑反映出川端完全站在日本殖民主义的立场,丝毫没有考虑日语作为国语教学带给中国学生的屈辱感,甚至不认为这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推行的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川端还进一步写道:“国民中文盲很多,据说下达了政令,有些村子除了村长外,谁都读不了。我们在考虑中国的时候,切勿忘记这一点。在离城市比较偏远的农村,人们的文化程度之低是我们日本人难以想象的。孩子们的灵魂是日本人应该开拓的处女地。开拓移民并非局限于农业。”(川端(27),1982:302)(笔者译)这种文化移民的言论,赤裸裸地说明了川端受到了日本政府的蛊惑,并充当文化移民的“先锋”。他不但认同了日本政府当时推行殖民东北的国策,而且积极推崇在儿童中实施日语教育,认为强化日语教育是殖民统治的有效手段。

川端在写给夫人秀子的书信中还提到,他非常喜欢俄国人和中国东北人,当他听到俄语、朝鲜语、蒙古语等时,感到亲切。川端的这种感情流露无疑是对伪满傀儡鼓吹“五族协和”的“认同”。他在《中国东北各民族创作选集》的序言中写道:

值此十周年的春季,我们迎来了年鉴作品集第一卷问世,乃文学界又一硕果,谨献最真挚祝福……各民族在协和文化的坐标下书写历史,乃最美之理想,可谓憧憬远大未来的呐喊之声。虽然日本现在在南方征战,但能够与其他民族协同建国、共兴文化的,非此国莫属。大东亚的理想首先在此得以实践,不仅因为其地理原因,而且能够与汉民族共建也是选择此处的重要原因。毋庸置疑,没有比汉民族更优秀的民族了,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更是如此。^[5](笔者译)

抑或川端并未觉悟到伪满政权不过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也是日本的殖民地。他一方面欣赏汉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提倡”与伪满傀儡鼓吹多民族“协同建国、共兴文化”,与日本在伪满推行的文化政策高度暗合。在川端的笔下,他所憧憬的“民族协和世界”,不过是以日本民族为核心

的世界,这也证明了他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国策持推崇态度。

2 川端康成的中国东北秋季之行

川端对日本在伪满推行的殖民统治所持的态度,在其后的秋季之行中更是绽露无遗。中国东北秋季之行,更确切地说是出席日本关东军的纪念活动。日本政府希望日本内地的作家们亲临中国看看激烈的战争前线以及日军取得的累累“战果”。1941年9月8日的《伪满洲日日新闻》详细报道了这支日本“笔部队”的具体行程,川端康成和火野苇平(1907-1960)等五人于10日抵达大连。以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为团队代表,在协和会馆做了题为“微妙的国际形势”的演讲,围绕日本明治政府鼓吹“大东亚共荣圈”问题,着重谈了日美苏三国关系。改造社是1919年4月,由山本实彦创立的出版社,曾出版综合杂志《改造》。

9月10日抵达当天,川端就给夫人秀子写了书信:“今早平安到达大连,风平浪静。日本关东军的接待非常隆重,中苏国境平稳明朗。勿念。如有急事,请电联日本关东军报道部。”^[6](笔者译)然而,川端给夫人的第二封信,却是10月6日才发出,这与春季之旅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其原因或许有三:一、与日本关东军招待的性质有关,寄收件都要通过军队报道部,信件内容必须接受审查,倘若书信中有不妥言辞,则会被军方没收;二、信件涉及不宜公开的内容,保管信件的川端遗族不便对外界披露;三、日程安排过于紧张,川端无暇写信。综合分析,第二种可能性较大。

日本关东军安排的秋季行程计划颇为紧凑,川端依次要去的地方是:9月5日从东京动身、6日乘船离开神户、7日到达门司、8日与火野苇平会合、10日早上抵达大连、11日旅顺、12日鞍山、13日沈阳、14日抚顺、15日沈阳、16日至18日长春、19日黑河、20日海拉尔、21日齐齐哈尔、22日至24日哈尔滨、25日至27日长春、28日吉林市、29日罗津、30日下午自罗津返回日本。

秋季之行原定于9月末结束,可川端却临时

决定邀秀子夫人来中国东北,然后两人自费前往华北旅行。于是,川端没有按计划回国,9月30日川端结束官方安排的访问后,迁至别处住宿,在沈阳住了约10天,延期的费用主要来自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洲日日新闻社的感谢费。这期间川端在日本关东军报道部办理了相关手续,一边进行文学创作。秀子夫人在10月20日抵达沈阳。两人去华北旅游的目的有二:一是川端打算创作与毛织厂女工有关的作品,去关内搜集更多素材;二是川端出于好奇心,想更多看看真实的中国,亲身感受汉民族文化。秀子夫人到达长春后不久,两人便前往北京,在那里停留了20余天。然后,他们又从北京前往齐家镇、张家口等地,参观了毛织厂。据秀子夫人回忆,其后所需二千多日元的旅费乃是该毛织厂的借款。11月12日至14日两人在张家口逗留三天,然后又返回北京,经天津返回大连。关于川端及其夫人在北京的生活经历,自述中记载甚少。秀子夫人回忆道:“当时北京的街道比现在电视或照片里看着干净许多。不管怎么说,日本军队作为占领军驻留在北京,总觉得心情变得复杂和厌恶。外国大使馆也在逐渐搬离,城市突然变得空虚了许多。”^[7](笔者译)除此之外,川端还在《中国东北的文学》中提到在中国东北的作家住房紧张、生活艰苦等问题,他似乎开始质疑华北地区和中国东北民众的真实生活,并非日本政府所“宣扬”的“王道乐土”。川端在文中还这样写道:“关于中国东北纪行我没有写在作品里,然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从中国东北到华北旅行后,我有两年都很难进入工作状态。这次旅行对于我内心的震动太强烈了。”(川端(32),1982:617)(笔者译)川端内心受到震撼,可以说与进入华北后的所见所闻密切相关。但是,川端具体看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无非是日本当局鼓吹“五族共和的美好愿景”与殖民统治下民众的苦难生活存在巨大落差。川端在文字里非常隐晦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秋季之旅长达近三个月,川端夫妇抵达日本神户港是11月30日。关于回国的原因,川端在《战败时刻》一文中写道:“秋季是由日本关东军招

待,同行的有已故山本实彦、已故高田保、大宅壮一。去黑河、海拉尔是乘的军用机。两次都没有写报道性的游记……11月末,当时住在大连,S氏催我赶紧回国。S氏似乎知道即将同英美开战,所以才给予暗示的。”(川端(28),1982:7)(笔者译)这里的“S氏”,通过秀子夫人的回忆录才知道是须知善一。此人是经营大豆生意的商人,在大连对川端夫妇多有关照。因须知善一与日本特务机关比较熟,所以提前获得了内部消息,故催促川端夫妇回国。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紧急返回日本一事,秀子夫人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回国不久,12月8日就开战了。这对我们的打击很大,丈夫不禁感叹,军部已陷入完全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泥沼之中。”(川端秀子,1983:144)(笔者译)这一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它从侧面反映了川端对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消极心态。川端通过1941年的春秋之旅,参观了东北各地,特别是在秋季之旅快结束时,日本关东军报道部长官曾试图邀请川端到中国东北工作,并许诺他只需搞自己的创作即可,也可从事一些文化相关的工作,但都被川端婉拒了。其理由并没有在日记或随笔中写明,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川端看到了与伪满傀儡鼓吹“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口号大相径庭的伪满洲国的现实。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曾盲目相信政府宣传的川端,通过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开始慢慢怀疑日本所发动的战争的合法性。然而,当时日本国内的恐怖环境让他又不得不选择沉默。

3 出任特攻队报道员的战争经历

川端11月30日结束中国东北之行。12月8日(日本时间),日本海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后,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本土也遭到美军的空袭,战局急剧恶化,日本战败俨然已成定局。4月1日,美军登陆冲绳岛,日军组建特攻队企图扭转战局。特攻队是日军最后的杀手锏,让特攻队队员通过自杀方式在战争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毫无疑问体现了军国主义的极端残酷性。

此时,川端出任了特攻队的报道员。一方面是因为川端与海军内部杂志《战线文库》主编大岛敬司有书信往来,而大岛也是一名海军报道员,他经常在信中向川端传达前方战地的消息。^[8]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海军大尉高户显隆的资料中得到若干线索。海军报道班作家成员的遴选工作,是由高户显隆的部下吉川诚一负责。据高户显隆回忆,吉川最初拜访了文坛巨匠志贺直哉,却遭到拒绝,但志贺直哉推荐了川端康成。4月10日,吉川前往镰仓极乐寺的川端家中面见川端,4月13日,川端承诺接受这一任务。虽然川端接受了吉川诚一的请求,但出发前却再三提出是否可以不写宣传类的官样文章,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奔赴前线。4月23日,高户显隆通知川端、新田、山冈到海军省集中,正式邀请他们作为海军报道班成员前往鹿屋基地。日本军队给予川端海军少佐(少校)待遇,新田和山冈享有海军大尉(上尉)待遇。4月24日,三人抵达特攻队基地,5月24日,川端提前离开基地。

毋庸置疑,川端的这段战争经历,显然对他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高户显隆在回忆录中写到,川端康成在鹿屋基地流泪目送每一位飞行员。川端在给养女的信中写道:“时限爆弹是可爱的人。”所谓“时限爆弹”是指即将付出生命的特攻队队员。不得不说川端对日军战士有着深切感情,不曾揭露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有美化战争的嫌疑。川端在1944年12月14日的《东京新闻》上发表了《语言的新生命》,文中写道:“特别攻击队的队名让日本古老的语言不断释放出新的生命……队名并非新词,但这个名字里注入了队员们的灵魂。”(川端(27),1982:378)(笔者译)由此可见,川端并非对战争漠不关心,他虽然没有用强烈的言辞去赞美战争,但却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于日本政府的国策,他虽以人道主义的观点做了批判,但迫于外界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给予一定程度的配合。对于特攻队队名的阐释,说明川端仍未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

川端康成作为特攻队基地特别报道员,奔赴了日本鹿儿岛县最南端的鹿屋海军航空队特攻基

地,即日军冲绳作战的前沿阵地。这次战争经历与中国东北之行相比,川端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中国东北之行毕竟是日本关东军招待的,去特攻队基地视察是为了报道战况,他在前线亲眼目睹了机场接连遭受空袭,军舰不断被击沉,战局日臻恶化,日军几乎失去了抵抗能力。关于这次战争体验,川端在《战败时刻》中写道:“由于特攻队的进攻,冲绳之战将会在一周到十天左右结束,因而催促我赶紧出发。到达九州后,战势每况愈下,从侦查照片什么的也能察觉出来。海上舰队全军覆没,飞机也所剩无几……机场连日遭受轰炸,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在防空壕里尚且安全。冲绳之战完全没有希望,日本战败已是迟早的事,我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了鹿屋。关于特攻队的报道我一行也没有写。”(川端(28),1982:8)(笔者译)川端在这里所说的“一行也没有写”指的是没有进行美化报道,但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生命之树》,发表在1946年7月的《妇人文库》。作品中虽然未出现具体的地名,实质上所写的是日本最南端的特攻队基地,可谓是川端作为特攻队基地报道员亲身经历为背景创作的唯一作品。

这篇作品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春至1946年4月25日的一年间里,将“战时”“战败”“战后”的时空浓缩于一文,通过主人公启子三天的行动和回想而展开。启子在水交社工作的姐姐处帮忙,结识了特攻队菊水部队的学徒士官植木,在阻止联合国军队登陆冲绳的战役中,植木驾驶特攻队专机战死于冲绳附近的大海。日本战败后,植木的战友寺村带着启子去看望植木的母亲,并暗示想与启子结缘,可启子却对死去的植木念念不忘,心里还想着如何殉情自杀。作品一开始就进行了大篇幅的环境描写,在黯然颓败的景象中,出现了“春”“春霞”“春日”“春雨”等一系列春意盎然的词语,与当时轰炸后的东京形成鲜明对比,启子从空袭后的废墟中感受到大自然强烈的生命力。大自然有四季轮回,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启子而言,她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目送特攻队队员的陨落,从而间接批判了战争的残酷。但是,川端作为日本人,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关注了战争掠

夺了无数的年轻生命,书写了战争的局限性,却忽视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川端担任特攻队基地报道员的经历,除了他自身的记述外,同行的作家新田润在《航空基地与文学》《海军航空队的侧面》等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山冈庄八则在《最后的从军》中详细描写了川端出发前日本国内充满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但是,他们对于战争的描写,与川端存在一些差异,都更加拥护战争。比如,山冈就写了亲身参加了陆战、海战、空战、潜水战等各种类型的战争,他也深知报道班(尤其是“作家班”)肩负慰问士兵的使命和责任。从这一点来看,川端还算不上拥护战争的狂热分子。除这两位作家的相关描述之外,还有一位日本军人也记述了川端担任特攻队基地报道员的逸事。1945年3月,海军少尉杉山幸照作为“特攻昭和队”被分配到鹿屋基地,同年6月接受归队命令,回到谷田部航空队。他在接受命令后与川端康成寒暄话别,没想到川端与他谈话之后,立即与司令部交涉,要求一同离开特攻队基地。得到许可后,第二天两人便从鹿屋基地出发,飞机因补给燃料中途在铃鹿降落。杉山回忆说,当时川端身体非常虚弱,似乎有些晕机,脸色苍白,走路不稳。两人利用飞机加油间隙,在士官食堂用餐,又开始闲聊,川端不经意谈到了“特攻的非人性”。这里的“非人性”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特攻队制度的非人道主义的批判;二是战事不断失利,使他亲眼目睹年轻的特攻队员赴死,反思日本的战争国策。

4 结 语

川端康成在战后发表的第一篇随笔《追悼岛木健作》(《新潮》1945年11月)中写到“战争结束后,我沉耽于日本古来的哀愁之中,甚至厌烦人世,欲隐遁山林……我现在深感自己的生涯尚未‘出发’便已结束,唯自己孑然回归旧日山河。我业已死去,此后除日本悲美之外,连一行字都不想写了。”^[9](笔者译)以明示此后只写日本之悲美。这段看似平淡厌世的文字,可以说是川端在战后

荒乱世相中对日本战败的一种规避或铭记。其后,川端康成在《哀愁》、《山茶花》、《天授之子》、《独影自命》等文章中发表的许多言论几乎都是基于这种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尽管川端本人认为对战争不曾有褒贬言辞,貌似中立,但川端在战争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协助,而战争结束前又隐晦地表露了对战争的否定。川端除1941年春秋两次中国东北之行,1942年,他以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作家的身份访问了长野县农家,且通过各种渠道发表了美化战争的访问记和哀悼所谓“英灵”的文章,该协会在纲领中宣称集全体日本作家的力量,创作表现皇国传统和理想的日本文学,其宗旨为协助宣传皇道文化,俨然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工具;1944年,他被日本文学振兴会指定为“战争文学奖”的评选人;1945年,他作为海军报道部成员,前往鹿儿岛县鹿屋海军航空队特攻基地采访战况。这些无不证明了川端从文化方面为侵略战争有过摇旗呐喊的行为。当然,在其大环境下,川端没有超然战争,写出正义的心声。相反,川端却撰文说自己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而他作品中的文字又无法掩盖他心灵深处浓厚的战败阴霾。

1955年发表的《战败时刻》中,川端漏写了在中国东北与自己同行的村松梢风和火野苇平两人,或许是因为村松梢风、火野苇平两人或多或少与战争有关。这种漏写抑或说明川端有刻意与战争保持距离,回避相关事情的想法,抑或是对战争认识的微小变化。又如,川端康成在1947年发表的《哀愁》中写道:“战争期间,我在往返东京的电车上和灯火管制下的卧铺上,阅读从前的《湖月抄本·源氏物语》。我突然想到,在昏暗的灯光下和摇晃的车厢里阅读小铅字,会对眼睛不好。而且,阅读这种书籍多少也掺杂着反抗时势的嘲讽意味。横须贺沿线的战争气氛也日趋浓厚,在此情形下,阅读木版印刷的王朝恋爱故事,确实滑稽可笑,可也没有乘客发现我有什么不合时代的举止。我甚至自嘲地想:万一途中空袭受伤,或许这

书的结实纸张对捂伤口会有所作用呢。这样,当我读到这部长篇小说约一半的第二十二、三回的时候,日本宣布投降了。”(川端(27),1982:392)(笔者译)

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战败两年之后,此时正是舆论聚焦战争责任的时期,川端自己坦言在战争时期“不合时代”,试图将自己装扮为消极抵抗战争的作家形象,其心可见。

综上所述,在1937-1945年期间,川端康成对战争的认识经历了迷惘、推崇、质疑和否定的复杂过程。川端的战争经历对其对战争的认识无疑有着重要影响,虽然战争末期从人性的角度对战争提出了质疑和否定,但这种质疑是非常隐晦的,否定也是极其微弱的。他只是关注战争夺走了特攻队员和日本士兵的生命,从文学家的角度叹息生命的脆弱和无常而已,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没有得到升华,也就无法认识这场侵略战争给亚太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更无从反省这场战争反人类的实质,最终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日本情结的束缚。川端的处世之道,既与他父亲川端荣吉留下的“保身”遗训有关,也有他对人性思考的局限。虽然川端的战争经历给他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但是他这种顺应时势、随波逐流的“保身”态度,使其在战争中避免了战火的无情摧残。总之,他的战争经历是特殊的,对战争的认识是复杂的,他的内心是挣扎的,也是抑郁的。战争对他的生死观乃至对他战后的创作影响甚大。战争结束后,呼唤战争中泯灭的“人性”成为他文学创作孜孜追求的主题。然而,他晚年走向了自杀的不归路,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巅峰陨落下来,成为了永久不解之谜。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青年项目“川端康成‘魔界’思想的流变研究”(15CWW010)。项目主持人:李圣杰;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含中国抗战)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及研究(16KZD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胡德坤]

注

[1]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28卷)[M].东京:新潮社,1982:7.

- [2]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27卷)[M].東京:新潮社,1982:189.
 [3] 奥出健.川端康成一戦時下満州の旅をめぐって[J].『國學院雑誌』2004(11):253.
 [4]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32卷)[M].東京:新潮社,1982:609.
 [5] 川端康成.満州国各民族創作選集[M].東京:創元社,1942:7.
 [6]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37卷)[M].東京:新潮社,1984:511.
 [7] 川端秀子.川端康成とともに[M].東京:新潮社,1983:143.
 [8] 大島敬司.海軍恤兵雑誌 戦線文庫[M].非売品,1943:84.
 [9]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34卷)[M].東京:新潮社,1982:43-44.

参考文献

- 王新新.当文学遭遇战争——对战争期间川端康成的一点考察[J].东疆学刊,2011(1).
 叶渭渠.川端康成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周阅.川端康成在战后的深层反思——论<重逢>[J].外国文学评论,2010(1).
 谭晶华.川端康成文学的艺术性·社会性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9.
 長谷川泉,羽鳥徹哉,林武志.第二特集 川端康成没後10年[J].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81(4).
 山中正樹.『十五年戦争』と作家『川端康成』(覚え書き):昭和十年代の『作品』を中心に[J].桜花学園大学人文学部研究紀要,2005(3).
 川端康成.哀愁[J].社会,1947(10).
 川端康成.『哀愁』細川新書5[M].東京:細川書店,1949.
 作家はいかに戦争協力したか 旧内務省の思想統制団体『懇話会』の資料発見[N].毎日新聞,1995-11-11(14).
 李聖傑.川端康成における戦争体験について—『敗戦のころ』を手がかりに—[J].ソシオサイエンス,2011(17).
 高戸顕隆.海軍主計大尉の太平洋戦争 私記ソロモン海戦・大本営海軍報道部[M].東京:光人社,1994.
 杉山幸照.海の歌声—神風特別攻撃隊昭和隊への挽歌[M].東京:行政通信社,1972.

作者简介:李圣杰(1983—) 男 汉族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lishengjie@whu.edu.cn

Yasunari Kawabata's Literature and Military Experience

Abstract: It is a widely-held view by Japanese scholars of Yasunari Kawabata that he adopted a detached attitude towards WWII. Indulging in Japanese classic literature, Kawabata neither praised nor criticized the war and was a cautious follower of moderatism. However, extensive examinations of relevant materials show that Kawabata had participated in military-related activities to pleas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By exploring Kawabata's two visits to Puppet Manchukuo and his position as a reporter of the Japanese Special Attack Units, this essay demonstrates how his views towards the war changed from confused, advocating, doubting to disavowal during 1937-1945. Kawabata's military experience left an indelible imprint on him,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his writing after WWII and his views towards life and death.

Keywords: Yasunari Kawabata; visit to Puppet Manchukuo; reporter of the Japanese Special Attack Units; military experience

Author's Information:

Li Shengjie (Male) Year of Birth: 1983
 Associate Professor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lishengjie@whu.edu.cn